

1805

邵陽縣文史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邵阳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邵阳县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邵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审 编：吕敬忠
主 编：李子林
责任编辑：姚衣波 罗友良
审 稿：龙益明 田 湘 罗华生
 邹中秋 唐畏保 黎笃柏
 黎西卿

邵阳县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邵阳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邮 政 编 码422100

1991年11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数1——800

湘印文准字(1991)第17号

邵阳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石新安生平简介	刘和平 (1)
石新安《历史思想自传》节选	(3)
回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二、三事	石远征 (7)
李斌生平事略	杨桦 (10)
胡典	唐长保 易德林 (14)
胡兆鹏(简介)	唐长保 (16)
著名苏联史专家李显荣生平简介	
	尹敬中 唐长保 刘和平 (17)
回忆我们的导师李显荣老师	阮海 王显力 (19)
难忘的回忆	杨愈超 (22)
弹道专家吕持平事略	江叔琛 (25)
蒋兆年生平述略	蒋永星 (28)
刘达武先生评传	刘堂林 (37)
抗日时期蒋志云女士与文强先生在上海	蒋柏青 (41)
海外杰出的企业家刘自成先生	刘敦宣 (48)
对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回忆	陈靖天 (52)
塘田学院勒令解散	(60)
写在塘田解散以后	为容 (61)
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学生告别武冈人士书	(64)
吕振羽在重庆的日子里	叶桂生 刘茂林 (67)
回塘田(二首)	吕振羽 (77)
忆油塘建党训练班	吕振羽 (80)
吕振羽与邵阳教育	匡洁 (82)

EA 67/05

邵阳南路花鼓戏·····	何绪成(84)
回忆母亲“一枝梅”·····	夏云河(96)
邵阳县布袋戏·····	任学余(101)
回忆解放前夕西望乡中心学校·····	唐春隆(104)
邵阳县私立平讹学校·····	尹敬中 何石球(108)
邵阳县义学·····	匡 洁(112)
记下花桥五龙岭追歼战·····	易泽湘(114)
回忆湘中二支队三团与人民解放军会师和合编的经过 ·····	肖文译(118)
我参加湘中二支队三团的回忆·····	陈常耀(122)
忆邵阳南乡剿匪·····	伍魁元(126)
血和泪的回忆·····	唐芳耀(130)
日寇在邵阳县的暴行·····	陈西林(132)
邵阳县人民抗击日寇·····	陈西林(140)
算盘尺秤有文章 ——解放前五峰铺商业情况纪实·····	<u>萧超然</u> (145)
邵阳县反动会道门概况·····	周立荣 李进华(156)
下花桥匪伪相互残杀始末·····	吴福祥(161)
关于蔡鸩生母王太夫人出生地的考证·····	唐畏保(163)
九公桥回民“经学会”·····	(165)
(资料摘编)	
古老的美夷候国遗址·····	杨平怀(167)
资江上游罗公庙遗址·····	杨平怀(169)
芙蓉峰·····	杨平怀(171)
宝庆坨栗·····	唐定国(172)
湖南“油茶王”·····	唐定国(173)

石新安生平简介

刘和平

石新安（1907～1978），五峰铺镇人。他从小倔强，不愿受制于人，幼年曾就读于私立循程中学。1930年出走长沙，参加何键的炮兵训练队。6月，彭德怀率部攻克长沙，石加入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三军团司令部副官、炮兵连长、军需程秣科长、团供给处主任、三军团供给部军械科长。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任第一军团第四师管理主任，一军司令部管理科长。他办事廉洁军公，深得彭德怀、黄克诚、聂荣臻、罗荣桓首长信程。

抗战时期，石由后勤工作改做政治工作。历任一一五师副官程该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山东泰西东汶支从政委兼工委书记、鲁西军区政治部部长、鲁西四分区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1943年冬被指定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调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副处长。他曾经独当一面，重新组织东汶支队，并采取果断措施，收编了一支七八百人枪的杂牌游击武装，争取无党派士绅张华县长抗日，在地方党的配合下。组成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石新安回冀鲁豫任七纵队二十旅政委、旅党委书记。在保卫济宁的战斗中，战绩卓著。部队进城后，他及

时通过贺功运动和反骄傲、反松气享乐思想的教育，掀起练兵高潮，干部、战士情绪高涨，在逢章集战斗中，部队伤亡十分严重，仅仅休整10天，又一举歼何冠山军一个团，出色地完成了攻坚任务。1949年11月，石新安接受向西南进军的先遣任务，率部进入贵阳市，任军事接管部部长。他亲自调查，精心组织，严明纪律，圆满地完成了接管工作。全国解放后，石新安历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贵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贵州省体委主任兼党组书记、贵州省委常委、昆明军区党委委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期间，“四人帮”在贵州的代理人李再含大肆挑动派性，围攻干部，镇压群众，终于酿成1969年的“7·29”惨案。为了保护干部和群众，石新安不顾陈伯达、江青的点名指责，率代表80余名，赴北京报告情况。周总理接见了，并作出决定，撤销李的职务。这才开始扭转贵州的混乱局面，保护了群众和大批老干部。1976年，“造反派”围攻省委，为李翻案。石新安当时正患病入院，仍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如焚，许多老同志也纷纷找他倾诉衷肠。他综合众议，写成“万言书”申报中央，和“四人帮”在贵州的代理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8年10月24日，石新安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石新安《历史思想自传》节选^①

我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出生在湖南邵阳县五丰铺一个地主兼商人（土改定小土地出租——编者）家庭，在当地也堪称书香门第、善良之家。十三岁前，是家庭经济的黄金时代。那时有田四十余亩，药房两处，纸房一处，酒房一处。父亲石真卿教私塾，家庭的一切经营全由伯父石东林掌管。我是家中长子，还有大弟石吉安、小弟石举安。当我三〇年离家时，家已被落为贫民了，这时只有田四亩、房数幢。

我是七岁开始读私塾，因不愿受约束，故时去时不去。后地方开办学校，即进入初小。但顽性不改，父亲有时督促，而母亲时而庇护，故每学期成绩都差。幼时贪玩，且喜爱逗鸟种花。基本上是要什么给什么。平时只与几个玩得来的小孩来往，也不和别人争吵。

大约在十二岁左右时，有一游学的王俊明先生，由衡阳来到我家。他学问很好，又懂中医，父亲喜爱读书人，即将他留住我家。不久将其全家接来。父亲要他教我念书，并要我向他

①此文摘自石新安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撰写的《历史思想自传》（一）家庭情况；（二）学校生活；（三）怎样走入革命等三个部分。

学中医。读书不到一年，感到一个人不好玩，要求不学。第二年，父亲为满足我的要求，积极与黄眉山先生在我家成立私塾馆。共收有学生二十名。我即在家读书两年，成绩很好。后因有一个同学去县城考学堂，我便吵着要去。后即考入县立循程中学。在循程中学初中两年的学习中，仍然贪玩，所以成绩不很好。同时，家境开始衰败。一是因祖父迁葬用钱过多，二是荒年生意清淡，田地无收，使得家庭收入下降。父亲开始教书养口。我不得不离开学校跟随父亲读私塾，心里感到很不愉快。

在转入私塾的开学前，父母曾对我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母亲、弟弟都在旁。我还记得他的一段话，他说：“因为家里不同了。没有钱继续送你去学校读书，但也不愿使你没书读，只好跟随我读书。你要争气，我们家里已三、四代没有脱过鞋袜种田呀！且是读书门第，望你多读点书成好人，免受人家欺侮。你尚聪明，能守本份。”父亲带着很忧伤的表情，我只好依从。当地习惯教私塾的先生可带孩子读书，学生称其为世兄，吃饭由大家负责。我虽去了，但不断听到闲话或讽刺，感到非常刺耳和羞辱，故不愿继续读下去，又不敢对父亲直言，也没想出什么出路，整天只有沉默。这个时候，由于家里无劳动力，又无资经商，故坐吃产业。父亲写了一封信和借约，要我带过去的一彭姓长工去地主李某家里借钱。李某与父亲是同窗好友，平时极好，每来我家都待他如上宾。那天我俩到他家，正遇吃饭时候，当时没见面。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出来，装作不认识似的，并说了很多叫苦的话。我也装着不认识，只是彭某将我父亲的情况和困难以及来意说了，他才将一百串钱的借约折合成三箩谷借给我们。茶也没吃，彭即挑了一担谷很快

地往回走；到家后又返回来接我，往返三十里路，就这样我们躲到天黑才回到家里。当彭与李某说话的时候，我非常冲动，认为有几个钱的人如此无情，架子这样大，我为什么要求他。几次想走都被彭制止了。回家后，彭将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父亲；回头父亲对我说：“你既知道这些事情，就应该好好读书”。以上两件事使我苦闷，也不想去读书。行也不是，坐也不是。父亲问我为什么消沉，是否有病？我便将这些情形说了出来。父亲既开导我，也批评说：“你有什么本事。既不愿求人，又不愿读书，除非给别人看牛吧！”当时我只说了：“不读书，不看牛，要饭也到外边去。”就走开了。从此便两次偷跑投军都被找回去。父亲未作任何责备。但岳父吕光达知道我仍有离家之意，便设法叫我做生意。送二百两大烟（因本地普遍种大烟），又凑合弟种的约计三百余两，随同本地肖存福先生去永州、全州一带作行商生意。父亲很高兴。由于没经验，加之用钱手大，结果亏本三分之二。家里也没说什么。不久岳父又凑了二百元要我做杂货生意，到年底因你欠我借，生意又告停业。这时父亲严加指责，自己极感不安，仍想往外跑。

第二年春节后（一九三〇年二月）随徐某（益阳人，在本地曾任保卫队长，为人很好。）连日偷跑到长沙。由他介绍我到何键办的炮兵训练队学习（训练队队长是徐的同事）。但由于训练队的生活很紧张，吃不消，便产生离队之心。恰好有一天徐来看我。我便对他讲了此意。此后，该队对我较松。我估计他与该队长打了招呼，并写了信给我父亲、岳父。不久，从家里来了一个亲戚。他与徐商量之后，就请了一席客，我就离开了该炮兵训练队，暂时搬到长沙市织机巷一部阳老板开的汉益

新旅馆暂住。这位亲戚转告我说：我父亲和岳父都要我回去，读书、做生意都行。当时我感到回去丢人，坚决不回去。他看到我态度很坚决，就想保荐我到长沙工业专门学校学一门专业。可是由于世风不好，谣言很多，该校不收新生，又加之传说彭德怀的部队离城不远了，全城戒严，故不敢回家，仍住在旅馆里。

我是红军进城三天后参加红军的。记得那天城里很乱，一个班的红军来到旅馆。他们态度很和蔼，其中的一个人对我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不要怕。如果愿意干红军的话，可随我去。”并说他是红军的一个副官，名叫刘洁。他所说的话正合自己的意愿。所以便毫不犹豫地随他到了军部，发了一个红袖章，成了一名红军战士，感到很高兴。从此，我便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与教育下，踏上革命大道，开始过着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

回忆父亲对我们教育的二、三事

(石远征等)

父亲石新安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的谆谆教导永远激励我们在生活、事业的激流中拼搏向前。

父亲很爱我们，对我们从小就要求严格，又不武断，我们家庭实行民主治家。我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经常由父母主持召开家庭会议，帮助我们制定假期生活、学习计划，帮助我们解决团结问题。记得我们有一个堂弟，由于没有母亲，五一年同奶奶一起从老家邵阳县接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和我们一样，称我母亲“妈妈”，妈妈也把他看成是亲儿子。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做衣服，有我们一套就会有他的一套，吃东西，也都是每人一份。那时他和奶奶同住一室，自然，由于没有亲妈，奶奶常常怜悯他，父亲给奶奶吃的东西，奶奶自己舍不得吃，总是留给他，但又怕我们去争吃，常常是等我们睡觉后偷偷地把他叫起来吃，小孩子嘴不严，第二天堂弟又告诉了我们，想来也是幼稚可笑，我们为此常生奶奶的气。父亲知道后总是严肃教育我们：“弟弟从小没有妈妈，我们应该更爱他、保护他，奶奶从小把他带大的，偏疼他一点是自然的、应该的”。并给我们讲“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这使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因此，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

以及我们姊妹长大后，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直相处得很好。

父亲保持革命军人作风，并且常常用来要求我们、教育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堂弟到一位姓陈的花工家去玩，见地里种了许多玉米，有一种颗粒尖尖的白色玉米我们没有见过，更没吃过，就问陈花工这种玉米好不好吃。陈花工就给了我们七、八个，让我们拿回家。不料此事不知怎么让父亲知道了，他不仅不让吃，还狠狠地批评我们，并把 we 关进装炭的小屋里“禁闭”了一个下午。开始我们想不通，哭闹着不服气。没有人理我们，哭久了，哭累了，又细细回想起父亲的批评是有道理：玉米虽然不是我们硬要的，但是说从没吃过，不知好不好吃，不是变相要吗？我们是首长的子女，人家不好不给，再说，陈师傅家孩子多，生活困难，自己种点玉米不容易，我们条件好，吃着玩就把人家一顿饭的粮食给吃掉了，……后来我们想通了，高高兴兴地把玉米送回了陈家。

父亲对我们生活上要求很严，从不允许我们借他的名义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利用开会或其他外出带家里人游山玩水或赴宴做客；就是在家，每年节假日军区有文艺晚会，父亲也从不让我们坐在前面。他总说，首长席是为首长准备的，你们只是家属，和群众一样，要对号入座。就是对特别爱看戏的老奶奶也只是在稍靠前的座位边上加一把椅子。

父亲不仅在这些生活小事上严格要求我们，对有关前途的大事也更是如此。例如：52年部队动员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要求母亲及叔叔带头，第一批转业到地方。1973年中央号召知青下乡，当时母亲已去世，我们姊妹仅小妹在父亲

身边，小妹刚高中毕业，学校及父亲所在单位都同意小妹留在父亲身边。可是父亲还是动员小妹下乡去了。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件棉背心。那是战争时期的棉衣，因为破了，解放以后改成了背心，一直穿了几十年，都没舍得丢。这件棉背心曾两次在贵州军区俱乐部被展览。可是他对同志却很大方，五十年代末，有位姓唐的警卫员来信谈到家里生活很困难，父亲几次给他寄钱。我们很小时，就几次听见父亲和母亲商量，给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家庭困难的同志寄钱、寄物，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炊事员刘师傅因胃出血住院作手术，父亲几次去医院看他，并自己出钱为他买“三七”，嘱咐他好好休养。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应该关心他人、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和警卫员，炊事员经常在后院种些蔬菜或玉米等，每年收获后，父亲总是让警卫员送到公共食堂去。直到文革开始，他被打倒，限制行动前，一直是这样。对此做法，有人觉得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说是办傻事，但父亲从不理睬这此。

我们的父亲是一位严厉而慈祥的老人，我们热爱他，更敬重他，他教给了我们怎样做个真正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李斌生平事略

杨 桦

李斌，女，原名李幼安（参加八路军后改名为李斌），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酃家坪山边坳的一个乡村医师之家。少年曾读过两年私塾，受到了当时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嵌下了“共产党讲人人平等”，“共产党讲妇女解放”的美好印象。故从小就向往光明，向往革命。

三九年初，李斌在临澧舅父家里，结识了林伯渠的侄子林炳南以及何晓兰、黄忠玉、陈超等人，在这些进步青年的宣传和鼓励下，她认清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有一天，李斌发觉林炳南在召集十余人开会，隐约听到他们说要去参加八路军，正在商量行程的方案、路线。当她确知这个消息后，就向大伙要求带她同去，并表示自己虽然体质纤弱，但决不拖累大家。大伙不同意带他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悄悄地动身出发了。两天后，李斌才发现。她顾不上带行李盘缠，也没有和家人打招呼，就一个人追赶去了。从临澧出发步行了一百多里，终于在湖南的津市追上了他们。谁知大伙还是不肯带她走，并以大姐大哥的口气安慰她说：“你年纪还小，这条路国民党盘查很严，大路是不能走的，只有钻山沟走小道，过几年长大些我们来接你”。一听此话，李斌急哭了，她发誓要跟

杨桦 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干部，李斌同志的女儿

在大家的后边，一直追到底。大家看她态度如此坚决，又怕她真的跟在后面追会出危险，只好答应了。一路上，他们脚上打满了血泡，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腿走肿了，人累瘦了。经过四十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安全到达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休息几天，治疗脚伤。过了几天后林伯渠同志又亲自介绍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

抗大总校设在山西壶关县境内，从西安到壶关山势险要，水急浪涌，他们既要克服走山路的困难，又要战胜水土不适带来的腹胀和浮肿等病痛。步行二十多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抗大总校的校园是一座古庙，破烂不堪，空旷寒冷。他们正赶上最冷的季节，屋内简直象个冰窟窿。学员们每人只发了一床一斤半棉花的薄被子，地上铺点草就是床，头下垫块砖就是枕头。夜晚经常会被冻醒过来，清早操练时，寒风象利刀一般，脸被冻烂了，耳垂冻肿了。学校里既无课桌又无课本，学员们每人发一张简易的小板凳，一叠自制的土纸，一支铅笔，写字时就着双膝，教材全靠手抄笔记。加之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学员们吃的是糠菜窝头和谷糠柿子混合制成的面糊糊。这些对于来自南方在家乡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李斌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但她生来一副好强的性格，不甘于人后。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多读、多背、多记，夜间也经常就着细细的松油灯加班加点苦读。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多的学习与操练，她不但跟上课程的进度，而且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基础的革命理论。从一个不谙人事的孩子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李斌同志被分配在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区，先后担任过文

书、秘书、工商公务管理员，民教科科长等职。她干一行爱一行，在每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当文书秘书时，她以写得快而著称；当公务管理员时，她能秉公办事，廉洁奉公；组织农运宣传抗日的工作，成绩尤为显著。四四年李穉在晋东作农运工作时，常深入敌后发动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宣传抗日。四六年七月，她随渡河的陈赓大军到了河南。她是十万渡河先头部队中三个女干部中的一个。过河之后被派去芦市县组织农运。当时芦市的山地中经常有小股土匪出没。上级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以利更好开展工作，给她配备了一个武装加强班，共二十余条枪。她就带领这支小分队勇敢地活跃在芦市的各个角落。成批的青年在她的宣传鼓动下，踊跃参军，成堆的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她和农民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每次在紧要关头都是农民兄弟掩护和挽救了他们。多少次在敌人扫荡中，他们这支小分队来不及撤退，农民们便赶紧把他们藏起来，等到夜幕降临时，群众便悄悄地送来水和干粮，直到敌人走后再接他们出来。有一次，敌军突然进村，村民们赶紧把队员们藏在地窖里，可敌人就偏偏驻扎在地窖口不远的地方，且几天不走。这下可苦坏了地窖内的队员们，两天后便断粮断水了。对他们生命威胁最大的是断水，第三天便有人昏倒。在饥渴难忍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喝自己的尿来维持生命。就这样，他们在地窖中坚持了一周的时间，敌人走后她们都奄奄一息了。在芦市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的小分队多少次和土匪遭遇，多少次和土匪发生枪战，又多少次和土匪发生格斗，她都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李穉同志又随军转战南北。四七年又到河南舞阳县任民教科科长。四九年六月随军到武汉，在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任秘书。五〇年随解放大军